

九省通衢与文化融合

——武汉城市文化漫谈

·高 路·

武汉由于它“九省通衢”的特殊地理位置，古往今来一直像磁石般吸引着八方来客，不仅商人垂涎于这里的通达，文人墨客、社会贤达慕名而来者也不在少数。“得水特优”的自然方位和“得中独厚”的区域所在使武汉被视为大有可为之地，无怪乎旧时人称：“人到武昌心自大，货到汉口自然活。”近代以来，尽管不断地遭到破坏，武汉这个城市还是日趋兴盛。

令人奇怪的是，武汉的兴盛开始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其城市文化初建于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当早期现代化风潮涤荡众多立足于封建自然经济的传统商业，磨蚀其光彩，截断其前程时，传统的商业城市武汉却侥幸地避开了如同晋商、徽商那样的悲壮结局，在新的风潮洗刷下立住了脚跟，并以“东方芝加哥”之誉再露头角，且至今仍不乏光彩。

武汉城市文化为什么独能长盛不衰？是什么让

它由封建重镇历经社会变迁而与时俱进,愈益发展?这其中原因一定不会少,但多层次的人口构成,善吸纳的文化功能以及武汉人好新、趋奇的特性肯定是武汉城市文化能与时俱兴,随时势而进的奥秘所在。

(一)

武汉城市的人口结构,从古以来就出现了“五方杂处”的情况。早在东汉末年就有史料记载武汉是“寻财运货、懋迁有无”之地;宋朝时,汉阳“南市之盛,甲于他郡”;至清朝,史料记述武汉是“往来要道,居民填溢,为楚中第一繁盛处。”但是填溢武汉要道的居民并不都土生土长于武汉,清末诸多史料载明,在武汉这个商业都会里,本地人大大少于外地人,有人统计后说:武汉“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夏口县志》里记载有:汉口 38 个商业会馆、公所中,本地商人所属仅二个,其余皆为外地商人组建或合建。

谁是武汉人?谁创造了武汉城市文化?迄今,有两种说法可供参考:一曰“此地从来无土著”,二曰“本乡人少异乡多”,显然后一说更贴近实际。

据载,汉水改道前,汉口只有“民人张添爵等父祖在彼筑基盖房”,后来填溢要道的居民是在汉水改道、汉口单独成镇以后从各处迁徙而来。迁徙武汉的首先有周边州、县的农村人,如汉阳县、江夏县、黄陂县、孝感县、咸宁县等,以致汉口出现不少以县区命名的街道和地方:黄陂街、沔阳街、咸宁码头、黄孝河。其次,有全国各地的商人、工匠迁徙来汉,来人之多可以结帮,所以清末有湖南帮、江浙帮、广东帮、山西帮、四川帮、江西帮、安徽帮、云贵帮等众多地方商帮聚集汉市。市外、省外迁徙而来的人落户定居武汉,在武汉生息繁衍,久而久之,组成了武汉城市人口群。到近代,武汉商界最大商帮要数湖北帮(即本帮)了,而湖北帮又是由早年落籍汉口的外来商人融汇而成。

涌入武汉的各地民众,无疑地带有他们各自独特的生活文化和价值观念,同样无疑的是他们要将自己的文化观念表现在武汉的生活之中,甚至对武汉城市文化施加影响,于是各地本土文化中的很多优秀部分、特色部分被吸收进武汉城市文化之中,成为武汉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典型者如黄陂,自黄陂人从不同方位涌入武汉后,武汉人的生活中就开始有了黄陂文化的印迹。时人生活中必须依赖的泥水匠、木匠、铁匠、铜匠、磨剪铲刀、修伞补鞋、打豆腐、包水饺等都是黄陂人的拿手好戏,至今为人铭记的名牌产品如高洪泰铜锣、曹正兴菜刀、谈炎记水饺等创始者都来自黄陂,江汉路上技艺精湛的雕刻艺人来自黄陂,让武汉闻名于外的归元寺五百罗汉相传是由来自黄陂的王煜父子所塑,武汉老人们最爱听的楚剧也是由黄陂花鼓戏演变而来。武汉城市文化在包容各地文化特色基础上多层构建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对武汉的生活和文化发生影响的不只是一个黄陂县而是众多州县和省份,因而武汉成了本土文化、外地文化以及开埠后西洋文化的汇聚点。武汉既以自己先进的城市文化辐射、影响、吸引着四方,又受着来自四方的乡土、城市、省外以及城外的文化影响,顺向的逆向的影响在武汉都发生过或产生着,故尔在这里本土与外域、都市与乡土、新生与陈腐、典雅与俚俗、深刻与肤浅、进步与落后的文化成份纷然杂陈。武汉城市文化是这样组成的,她的特点也就在这样的组成中显现:内外复合、新陈杂揉、雅俗多层。正因为如此,武汉城市文化才能活泼多变、进退灵便。她永不困死于一种形式,而具有随新而变、随势而安、随时而进的生命力。

(二)

黑格尔曾表述过地理位置对人文态势的影响:“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这句话非常适用于解释武汉人的通达性格。武汉正是依仗于两条河流的贯通往来,具备了

“通”“合”的文化特性，更何况武汉还居于“得中”特优的吞吐之地——既非初级的集散中心，又非终点的消费市场，这个中转点地位更加强、扩大了她的“通”“合”特性。生活在这一特殊地带的武汉人较少一般地域文化心态中的那种排他性，而多了一点对各种文化能包容甚至接纳、参与的性格。

在武汉，即使是一般市民，也不以狭隘的地方眼界斜视外地来客。这个地域的广通、大气让这个地方的人也养成了对外来客人的大度和大气，他们欢迎并承认外来的能人，愿为来自各地的能人提供施展才能的地盘，而自己甘愿做这些能人的顾客和吹鼓手。于是，武汉有了外地人来汉经营而冒出的众多名商、众多精品、众多老字号。这些人大都并不土生于武汉，他们却以汉商闻名，他们的产品、手艺很多是从各地带来，却以汉货精品享誉国内外。

武汉人的精明就表现在这里，他们能以开明、先进的城市人形象吸引并吸取各方技艺、各地文化，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的技艺、方法能带来财、利，你就可以为武汉接受，武汉人还能很快将其技艺学来变成自己的拥有。如乡下人挑担进城卖的水饺、鸡汤、鱼元、肉糕，武汉人无一不能像模像样地做成家居菜肴甚或挂牌出卖。武汉人也许看得太多了：成功的、失败的、暴富的、倾倒的，他们不愿那样去出演自己的人生，不愿去承担那么多的风险和苦辛，只想站在后排品尝、占据码头欣赏各路来客争锋的快乐，这就是武汉本土大商人屈指可数的原因。见识的广阔冲淡了他们的闯劲，特别强的适应力销蚀了他们的创造力，这就是汉味精明的特点和弱点。

武汉很少有完全自己独创的产品，几乎每一精品、名品溯源都到了外地，但武汉人特别能用独到的工艺改造外来产品，让它带有汉味并成为名品。大量的汉货特产就是汲取外地产品之优加上自己工艺制造之特而形成。如汾酒，本产自山西，武汉人仿山西的做法，用大米酿造，使其清辣醇厚，再加上自己的特色工艺，就变成了

自己的特产——汉汾。武汉人还特别能综合各地精神文化于一体,使其成为众人皆能接受的文化形式。如山陕商人将他们所喜爱的西秦腔带来武汉,安徽商人把他们所欣赏的二黄腔带来武汉,武汉的城市艺人将二腔融汇在一起,创造了被广泛接受和喜爱的新声腔剧种——皮黄腔。

武汉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壁垒分明的人群、印记清楚的物品一经进入武汉就会被融汇、同化、合一,有这样一个典型事例颇能说明这一点:清代,清、洪帮会在长江流域划分地盘,以汉口为界,汉口以上至重庆属洪帮势力范围,汉口至下江则归清帮所属。清、洪二帮各有极严的帮规及特殊的忌讳,以汉口为中平分秋色,互不相让。然而武汉的著名会党人物杨庆山却能既坐镇洪门又插足清帮,他一面任洪门“栖霞山”“太华山”寨主,一面又到上海拜于清帮头子张啸林名下入籍清帮。势同水火的两个帮派能在武汉容于一人之身,足可窥见各地人对汉口这地方特殊的容纳功能的默认。

因此武汉人的性格里自然地含有多重成份:既有南方人处事的精明,又有北方人为人的耿直,既有东边人做事的精细,也有西边人处世的劲直刚强。武汉人正因兼具各地人的性格特征,才被人们呼为“九头鸟”。无论呼者褒贬如何,这一称呼反映了武汉城市文化特征,反映了武汉人处在复杂多元的文化氛围之中确是无争的事实。

(三)

因商而兴、因商而发展的武汉,其城市文化很早就出现了好新、趋奇、赶时髦的特点,从各种描述汉口风情的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开埠前的汉口就已有“无数茶坊列市闾,早晨开店夜深关,粗茶莫怪人争嗜,半是丝弦半局班”的景象。城里富贵人家的消费已达到“银牌点菜莫论钱”的地步,一般市民也常到茶楼消闲,以致“客到先争好座头”。街市中各种行业的买卖多不胜数,商人们各

施小技,自展头角,大街小巷弥漫着商业习气和商界应酬之风,同行间争风逐利的局面也随处可见。受商风、商业意识熏染的武汉人尤其是汉口人,对新事物、新观念特别敏感,对外来文化的心态特别开放。这正是武汉城市文化能够不断出新、不断变奇的重要基础。当汉口开埠,西方文化、风俗袭来时,汉口市民就较少以旧有伦理道德观念深闭固拒,而能较快地从抗拒走向认同,并能从实用观念出发加以模仿和再造。汉口开埠后不久,市民中就有人穿洋布、用洋货了,有些家庭宴请宾客也不再满足国内的山珍海味,转而追求西方风味:饮洋酒、食蛋糕、喝香槟、啜冰块。一度把以轿代步视为气派的达官巨贾们开始追逐坐人力车的享受,大亨们还争先恐后地以买汽车、坐汽车来摆阔。曾“崇信佛教、瞻拜土木偶”的市民受西方传教士影响后,不少人转而奉天主耶稣了,“每值星期,亦赴教堂做礼拜。”受西方妇女解放、自由恋爱、男女平等近代观念影响的年轻人,开始“男女杂坐不以为嫌”,而且有公然追求自由结婚者。还有人模仿外国人的交往礼节,“易跪拜为鞠躬,小礼一鞠躬,大礼三鞠躬”,穿西式服装,女子剪短发在市内已不足为奇,休闲时跑马、结婚时披纱也在被模仿之列。

对洋货、西俗的崇尚和追逐,其实也就是对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崇尚和追逐,这种心理和作为固然助长了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在中国市场的倾销,但它同时也对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着刺激作用。武汉工商业在近代能较快地发展,就是明证。一个没有追求新奇、崇尚新潮人群的城市,恐怕是难以蓬勃发展的。

汉口在追新、求奇、趋变过程中也带来许多弊端,如商人们急功近利、庸俗趋时、逢迎媚外,汉口人文化生活的粗俗、肤浅浮泛、缺乏厚重感等,但它客观上确实为武汉早期城市现代化历程减少了许多阻力。武汉城市文化能够随时代前进就曾得益于此。